

「家國天下情懷」的中國文人

張作錦（臺灣資深報人，曾任《聯合報》社長、總編輯）

許倬雲教授是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歷史學大家，著作等身。如果我不在報館工作，向他請教、邀他寫文章，怎麼會有機會認識他？

我何時結識許院士，已記不清楚，大體應該是「陳文成命案」發生的時候。1981年5月，居住在美國匹茲堡的卡耐基梅隆大學教授陳文成返臺度假，7月3日被發現在臺灣大學校園內離奇身亡，驚動海內外。大家都希望有一可孚眾望的人士協助處理此事，當時仍在匹茲堡大學任教的許院士，就義不容辭地參與了這件事，把他的意見交給《聯合報》發表。

那個年代的通信設備極簡陋，連傳真機都沒有。大家知道，許院士自幼就手腳不便，用手掌握著筆，一筆一畫地刻出字來，然後用越洋電話報到臺北。接聽傳報新聞的電話本是記者同仁的工作，但感於許院士的慷慨與熱心，多半由我自己接聽記錄。以後許院士常回臺灣講學，後又返臺常住一陣子。他不以學問傲人，使我得有親近、認識他的機會。

許院士最近幾年出版了好幾本不是「老生常談」的好書，如2006年的《萬古江河》，2017年的《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大陸版名《中國文化的精神》）。凡讀過這兩本書的人，都可看得出，許先生念念不忘中國、中國人、中國文化，以及大格局的世界文明。同儕和讀者普遍認為，他是一位有「家國天下情

懷」的中國文人。

這可能與許先生的身世有關。他幼小即在國家外侮內亂中顛沛流離，來臺後才稍能安穩讀書，後來又離鄉背井去美深造，回國後在「臺大」任教，在「中研院」從事研究工作。以後雖然較長時期在美國教書，但他念念不忘臺灣，常回臺灣講學，也到大陸做客座教授。他倡議成立「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向全世界推展漢學研究，他幫助臺灣政治大學進行一個大型的「形塑中國」研究計劃，目標在「界定自己，走向現代，融入世界」。

他和沈君山教授共同幫助殷之浩先生與殷琪女士父女開辦「浩然營」，選拔兩岸三地青年精英，在世界各地「安營紮寨」，每次講習四星期，希望經由這些青年領袖的思想融合，進而融合整個中國。1990年，第一屆「浩然營」在美國加州開課，兩岸三地學員共30人，臺灣方面參與的人員包括馬英九和陳定南。

當「二二八事件」還是禁忌話題時，1987年2月26日，許先生在《聯合報》發表《化解二二八的悲劇》一文，直指當局應特設查證委員會，釐清責任並釋放在繫人犯，結束歷史悲劇。第二年，1988年的2月27日，許院士在《聯合報》再發文章《又是二二八了》，提醒執政當局要儘快善後。終於，臺灣當局在1995年2月28日發表調查報告，正式向不幸受難者道歉，並立碑紀念，希望能撫平不幸的歷史傷痕。

許院士出生時身體就不方便，但他毅力驚人，一一克服。不僅進入學術殿堂，著作等身，而且幾乎是全神貫注地關懷國家社會問題。這樣的人，性格當然是很堅強的。但許院士雖有「冷靜的腦」，卻更有「溫暖的心」。在與他四十多年編者與作者的交往中，我至少看到他流過三次眼淚。

許先生2001年回臺定居，在「中研院」附近購置公寓之前，先在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租屋居住，樓下有一日式餐店。有一次我們在那裏小聚，他歡喜講歷史故事，我歡喜聽。抗戰時，許先生一家住在長江口岸沙市。川軍出川，趕赴前綫，有運兵船沿江東下，在沙市上岸。許院士的母親把他放在門前的石獅子上坐著，她自己忙進忙出地燒開水、提開水，給那些年輕的軍人解渴。

「母親心疼又著急的樣子，我現在還記得。她提著一大壺開水，忽然跟我說：『這些孩子，從此一去就回不來了。』說完她就哭了。」我眼前已過中年的許院士，也毫不掩飾地淚流滿臉。

為了紀念 2005 年抗日勝利六十週年，中央電視臺早兩年就開始籌拍大型文獻紀錄片《抗戰》。一位參與製作的朋友從北京打電話問我，怎樣可以聯繫上許倬雲教授。我說巧得很，他正在南京大學講學。朋友後來告訴我，他們錄像《大家訪談》時，許院士回想抗戰期間多少將士的捐軀、多少百姓的流離，泣不成聲。許院士回到臺灣，在萬芳醫院休養，我去看他，他跟我談到紀錄片的事。八年國殤，重上心頭，他一面說，一面飲泣。丈夫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

我因為報館工作上的關係，有幸與很多學者來往，包括臺大歷史系的張忠棟教授。他 1990 年因肝癌在臺大醫院開刀的第二天，我就去探望他。他後來因為政治理念的關係，與朋友有些疏離，但我們仍然維持往來。1999 年盛夏 6 月，與許院士共同參加一項餐會。餐後我要開車送他回家，他說：「我們一起先去醫院看看忠棟吧！」到了臺大醫院一間單人病房，張教授蓋著被子躺在床上，腹部生水，肚子挺得很大，臉上戴著氧氣罩，已不能言語，他的公子一旁侍立。許院士問張教授：「還認得我們嗎？」他點點頭。我們說了一些不著邊際的安慰話，黯然而退。

離開病房，走到走廊上，許先生哇地一聲哭了出來。他們有師兄弟的情誼：「是我在臺大歷史系做主任時，送忠棟出國深造的。」幾天之後，張教授走了。

對國家、親人和朋友的情、愛，永遠擱在許先生心裏最重要的位置。而且，不僅表現在他與學術界同行的身上，也惠及我一介記者。2003 年我自《聯合報》退休，事聞於許院士，他賜文「以壯行色」，題曰：「將軍辭營志未消——送新聞老兵張作錦退守後防。」這樣的榮幸，真受寵若驚。只因當時仍受聘為報館顧問，且依然每天上班，恐招「利用職權」或藉史學大家以自炫之譏，故取得許院士諒解後暫未發表，後由許院士納入他自己的《倚杖聽江聲》

散文集中。2015年，《天下文化》為我編輯自選集《誰說民主不亡國》和《江山勿留後人愁》兩書，特央請許院士同意，將此文移作選集的序言，一以為拙著增色，一以稍稍彌補多年來的歉疚與遺憾。

在這篇文章中，許院士敘述曾與我有過的兩次「長談」以及談話的經過與內容。可看出一位學者和一名記者共同的關切，並展現出臺灣社會轉變的軌跡。

「我們第一次長談，正是在臺灣風雨如晦之時，我們二人都投身沈君山兄發動的革新保臺運動。有一次，我返臺參加君山兄主持的會議，討論臺灣的局勢。散會後，作錦兄送我從麗水街走向永康街。我步履遲緩，在小公園中休息一次，抵家後又續談未了的話題。記憶中，為時兩小時的談話範圍，由國際大勢、國內情形討論到改造『國會』、改善族群關係等諸項課題。其時臺灣處境艱難，民心驚慌，海外華人的心也大多被保釣運動席捲而去。然而，我們仍覺背水之戰，未嘗不能置之死地而後生。」

「此後又有一次長談，則是在紐約一家旅館。那時，美東國建會同仁有大型集會，餘興節目正在進行。我們都是不喜歡熱鬧的人，遂離開會場，借大廳一角，再次傾談臺灣現狀和國際情勢。臺灣已走向富足，民主化過程已發軔，但是內部不和諧的隱憂也已漸漸露頭。我們也因此談到民主的定義、政體與國體之間的兩難問題及國際情勢。這次長談，也是兩小時。」

「這兩次長談，長留記憶之中。一方面是談得深入，所見略同；另一方面，更因為當日估計的大局趨向，半個世紀以來，雖未能全部中的，也相差不遠。我們當日的預估未能全中，主要因為失估了一項因素——我們未能料到臺灣的老皇民們仇視大陸之深，及輕視中國人與誤解中國文化之甚！今日回想，只是失估了一角棋勢，全盤棋局遂有如此不同！」

許院士還憶及一些小事。「在海外向臺灣投稿，今日有傳真（fax）之便；但在數十年前，為了趕時效，唯有用國際電話口授筆錄。我的口述稿，勞累了臺北新聞界的同仁。作錦兄其時已主持《聯合報》編政，有時還是親自執筆，記錄我的口述稿，其敬業精神令人欽佩。我尤其感激者，是口述之前他提供的

信息，啟沃我的思路；筆錄之時，他隨手修飾潤色，遂點凡鐵為可讀的文章。投稿者與編輯之間，能有這番緣分，實為奇遇；求之今日的傳真或電子郵件，恐已不易再現了。」

許院士因為研究和講學的關係，常常來往於匹茲堡和臺北之間。2010年，他忽然惹上官司，從那時起就沒有回臺灣。去年3月原告病故，官司應可結案，我問許院士：「可以回來了嗎？」他表示官司早已和解，他長期不回臺灣的緣故，乃是在兩度脊椎大手術後，健康迅速退步，涉訟不久，已經不能回來。現在他起坐都不方便，醫生嚴令不准他坐飛機，回臺灣不知要何年何月了。

許倬雲院士是一位歷史學家，眼觀十萬八千里，耳聽上下五千年。但是他的心，不僅是放在臺灣，現在及未來的臺灣，更是放在整個中國，現在及未來的中國。

歷史長河經眼底，霸業興廢上筆端 ——記我所認識的許公倬雲

陳方正（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前所長）

神州風雲變色，新中國成立，已經是七十年前事。它促成了許多學子遠渡重洋，在新大陸立足揚名，成為學界顯赫人物。其中四位歷史學家，我有幸相識，他們的經歷、成就大體相若，性情、稟賦、懷抱卻迥然而異。我和他們專業不同，天各一方，卻有幸逐漸相熟乃至成為朋友，也算是緣分不淺了。

我最早碰到的是張光直兄，那是 1958 或者 1959 年在麻省劍橋一個中國同學的聚會上，他黝黑，矮小的個子，堅實簡潔而又自信的語調，給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但當時我對考古學一無所知，他對物理學興趣也不大，所以話頭不多。過了一兩年，通過羅球慶兄介紹，我得以不時去余英時兄家裏參加他們新亞校友的聚會，從而和他認識，更由於曾經在香港出版的《自由學人》上接觸過一些西方史學掌故和理論，所以能夠談得起來。至於彼此相熟，則是十多年後他到中文大學來當新亞校長，我們一起參加負責大學體制改革的「工作小組」所帶來的機緣了。何公炳棣輩分甚高，我知道他是從拜讀其大著《東方的搖籃》（*Cradle of the East*）開始。而得以相識，則是因為 1990 年代初和金耀基兄等幾位同事創辦《二十一世紀》雙月刊之故。其時何公從實證史學轉向思想史領域，其開端便是在我們這刊物上發表一篇「檢討」杜維明對「克己復禮」所作

詮釋的文章，由是引起了他和新儒家學者相當激烈的筆戰。此後他經常來港，時相過從，遂有不少機會聆聽他的高論與往事，乃至得以見到他自傳的稿本。

至於認識許公倬雲，也和《二十一世紀》分不開：他不但從頭就參加了我們的編輯委員會，而且創刊號的《二十一世紀評論》欄目就是以他的大作《理想幻滅，歷史不會終結》開篇。此短文發表於1990年10月，卻像是已經預見僅僅一年之後的蘇聯解體和接踵而來的福山驚人之作《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而事先做出事後證明更為確切的不同判斷，即使純屬巧合，其眼光之犀利也真是令人驚訝！時光荏苒，三十年轉眼過去，面對今日世界亂局，特別是熾烈的俄烏戰爭與日益緊張的中美對峙，我們自不期然又會想起許公十年前出版的《大國霸業的興廢》來。這題目並不新鮮，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遠在一個世紀之前就已經預言西方的沒落，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出版《大國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也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許公此書其實是一本談話錄，以論列中國歷代興衰及其近代應付巨變的得失為主，涉及西方歷史進程乃至中國在20世紀之崛起者，大約只佔四分之一篇幅而已。但無論如何，能夠在英國公投脫歐和特朗普橫空出世之前四年，就再度拈出這個題目來，那也真和世界大勢的演變若合符節，使讀者眼前為之一亮。

上面這四位史學家的人生途徑，大體上是平行發展的，即在中國大陸或港臺成長，大學或研究院畢業之後到美國攻讀博士學位，然後在彼邦勤懇治學，嶄露頭角，卓然成家。由於早年經歷以及史學的陶冶，他們都懷有相當強烈的家國情懷——雖然其政治取向並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眾所周知，英時兄傾心自由、民主傳統，經常評駁時事，褒貶人物不稍假借。何公和光直兄雖然不常發表政治議論，但一直看好也認同新中國，經常回到大陸參觀、考察、演講，這是大家熟知的。至於許公，則態度可形容為保持善意的中立和力求客觀：《大國霸業的興廢》一書末了以「飛龍在天」「亢龍有悔」和「群龍無首」來形容中國所面臨的處境和選擇，那正是這種態度的最佳寫照。

但無論其政治傾向如何，在這四位知名中國史學家之中，有興致與精力走

到歷史專業領域之外，去認真探討、分析、評論人類歷史整體與世界大勢，進而著書立說的，卻僅得許公一人而已。其故安在，頗值得思考。當然，像所有關乎人生選擇的問題一樣，這歸根究底，最後總不免牽涉個人性情、氣質與稟賦。但除此之外，它無疑也和個人成長環境、際遇、機緣有相當重要的關係。從這個方向想去，我們會發現，許公與以上三位並世歷史學家的確有兩個大分別。

首先，在表面上看，許公和他們一樣，都是生於憂患，成長於流離動亂，經歷了抗戰、內戰、逃難、漂洋過海和一番奮鬥，這才得以在一個嶄新國度立足。但稍為細究就會發現，其實大不然。當然，在抗戰期間許公所受的顛沛流離和驚恐危險，所目擊的淒慘痛苦情狀，比之定居於北京、昆明或者安徽鄉間的其他三位要多得多。這是因為他父親是負責供應軍糧民食的官員，必須在戰火四起的前綫附近工作，而他自身罹天生殘缺之苦，不能夠遠離父母。但抗戰勝利之後那幾年，他回到老家無錫居住，已經開始體會到傳統士大夫家族的滋潤和味道。而自此之後，比起那三位齊輩來，他的人生更是穩定、暢順和幸運得多了。大陸解放之際他渡海赴臺，甫入臺大便以文史考卷一鳴驚人，得到系主任、院長乃至校長的賞識，自此一帆風順。畢業後入文科研究院，再入史語所，儼然成為當時雲集南港眾多古史、甲骨、考古專家所著意培養的接班人。所以，他的物質環境雖然艱苦，心理上卻充滿希望和自信，期待將有一番大作為。八年之後他束裝就道，赴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的時候，其實已經是一位獲得安身立命之地的成熟學者，而非剛剛踏上征途，準備「結死寨，打硬仗」（何公炳棣在《讀史閱世六十年》中的自況）以求立足的外來客，其心理深層的安穩與後者之緊張委實不可同日而語。所以他自覺在古史方面遊刃有餘，沒有也不需要「在（導師）顧立雅先生身上讀到什麼中國東西」即能夠寫出論文（見李懷宇撰《許倬雲談話錄》），甚至還參與其時風起雲湧的民權運動，這也是順理成章的。無論如何，拿到博士學位之後不久，他就踐約返臺，隨即臨危受命接任臺大歷史系主任，同時在史語所任職，重新回到了以前的穩定軌道上。此後八年間，他在臺灣學術界如魚得水，俯仰自得，行有餘力，更與一批同聲

同氣的朋友集會結社，探討、議論時政，雖然經常處於政府強大壓力的陰影之下，而為此擔驚受怕，卻從來不缺乏師友同儕的鼓勵、支持與照顧。在不惑之年赴匹茲堡大學訪問時，他已經是一位地位穩固的資深教授，其後決定逗留不歸，顯然也很順當地獲得了長聘教席。統而言之，上天好像是要補償許公生來殘缺之憾，為他安排了一條特別安穩暢順的事業道路，使他有充分自信、餘暇乃至衝動去探討、議論專業以外的大問題。這是自進入美國高等學府之始，便必須面對無形但長期持續專業壓力的其他三位學者絕對無法享受的寬鬆環境。

其次，西方學術風氣講究專精，學者即使觸類旁通，也大多是為了另闢蹊徑以擴大本專業研究的範圍，或者以別的專業補其不足，而絕少願意單純為了興趣而不惜浪費精力於其他科目。記得英時兄曾經把做學問比作下棋，而有「高手無廢子」之語，那多少也就是這個意思吧。然而，許公在芝大攻讀博士學位那五年之中，卻以大部分時間遊心於韋伯理論、兩河與埃及古史、歐洲中古社會，乃至啟蒙運動等西方社會學與史學問題。到了匹茲堡之後，由於歷史系的覆蓋面廣，而且社會科學背景很強，所以他在文化學、宗教學、社會學、西方史學交的朋友特別多，雖然聚散無常，「大家已經不再聚會。可是，我一直還在這些課題上打轉」（見前引《許倬雲談話錄》）。所以，既由個人興趣，也憑因緣際會，許公的學養、背景要比其他三位開拓得更為寬廣，這自然為他從中國歷史轉向世界史和當代世界評論鋪平了道路，甚至其本身就是一種向其他領域拓展的強大吸引力。而其他三位史家，包括對於韋伯學說、軸心時代、巫文化等理論有深刻研究的英時兄，則顯然都沒有他那樣廣泛的興趣——再打個比方，在黑白方圓世界之中，他當屬「宇宙流」無疑！

許公放眼中外，盱衡古今，這種豪邁氣概是否和上面提出來的兩個原因有關，自是見仁見智，不易確定，也難以深究。另一方面，即使將他 1980 年代初的重要專著《西周史》和晚年的力作《萬古江河》相比較，也可以見到兩書出版雖然相距二十多年，其核心精神則一仍舊貫；只不過前者追求嚴謹細密，著重湮遠古史的考證與分析，後者則宏觀流暢，以抒發對中國歷史整體的見解為主，但底子裏兩者都屬通史性質。它們與錢夫子的《國史大綱》類型不同，

精神則相通，與何公《東方的搖籃》、英時兄《朱熹的歷史世界》、光直兄《中國青銅時代》等著作則迥然而異。其分野就在於：前者是宏觀的、整體的，後者則無論其篇幅規模如何，卻始終是環繞特定問題而展開，其有限度目標即在於解決此具體問題。從此看來，僑居西方大半輩子的許公，心底裏嚮往的仍然是司馬公「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那種境界，並以此為最高理想，這是以上三位史家所早已經有意或者不知不覺中放棄了的（見李懷宇撰《余英時談話錄》論「通史」部分）。那麼，他能夠不受西方學術大環境影響而堅持發揮這個理念，恐怕和上面提出來的原因也不無關係吧？

90年代初，許公應邀來港出任香港中文大學「偉倫講座教授」並訪問歷史係數年。當時我忙於中國文化研究所所內工作，特別是推動《二十一世紀》的發展，竟沒有趁此良機認真向他請教，可謂失之交臂。其實，那時我正對不同文明在西方衝擊下所作反應的比較發生濃厚興趣，發表了一篇關於土耳其現代化歷程的長文，蒙許公惠然嘉許。我生性魯鈍，卻仍然不懂得積極響應，回想起來委實慚愧之至。

歲月匆匆，如今世界大國之間的衝突越演越烈，已經由暗轉明，從無硝煙演變為（即使是間接的）兵戎相見了，其錯綜複雜程度以及（無論就地理抑或性質而言）範圍之廣，都是人類歷史上所從未夢見，而至終將伊於胡底，則更非任何人所能夠想像——在16世紀歐洲宗教戰爭方興未艾之際，有識之士如博丹（Jean Bodin）、蒙田（Michel Montaigne）等輩，想來亦曾生出相類似的迷茫之感吧！處此滔滔世變，許公雖年逾耄耋，但頭腦清晰，意志頑強，在夫人悉心呵護下，身體也仍然朗健，實可喜可賀。正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我們深信，他必然能夠不負上天之託，以同樣堅強的精神邁向期頤，繼續為我們論列瞬息萬變的世界，是為祝為禱。

2022年6月27日於用廬